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第 8 期（总第 416 期）

2024 年 8 月 5 日

-
- ◆ 要着力抓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等重点任务……………农业农村部（1）
 - ◆ 新任安徽省委书记韩俊：出身寒门，最懂农业……………农政司知事（2）
 - ◆ 韩俊履新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曾得“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赏识…上观新闻（7）
 - ◆ 跨越世纪的印记……………新四军纪念馆（9）
 - ◆ 论乡村振兴中的农民增收……………张红宇（11）
 - ◆ 如何破解“大国小农”之困……………张铁军（17）
 - ◆ 稻米种植的全球史……………张瑞威（19）
 - ◆ 从我国食物自给率的变化看构建农业新发展格局……………杜 鹰（22）
 - ◆ 肥硕多产科学育种：近代西方对中国家猪的考察和利用……………黄 田（26）
 - ◆ 乡村振兴需要解决好“五个问题”……………陈雄飞（31）

要着力抓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等重点任务

农业农村部

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韩俊主持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指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六个坚持”的贯彻原则。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统一思想行动，以谋细抓实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的实际行动，迎接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要着力抓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等重点任务。要始终把准把稳农业农村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守正创新、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牢牢守住底线红线，坚持从“三农”实践发展需要出发，从农民群众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稳慎推进、善作善成，确保改一项成一项。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健全“5 个体系”的实践要求，立足“三农”实际和部系统党建工作实际，持续发力纵深推进部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聚焦全面健全组织体系，以深化“四强”党支部创建为抓手，持续提升党支部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着眼日常健全教育体系，分层分类抓好培训，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努力抓在经常、融入日常。紧盯重点健全监管体系，综合运用好内部巡视、党建督查等手段，不断提升政治监督的效能，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的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督。围绕贯通健全制度体系，将党建工作制度执行情况纳入评优评先、绩效考核、党建述职评议考核重要内容，不断提高制度的约束力。强化担当健全责任体系，部系统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部领导和各司局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组织要主动担起责任，真正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

（2024 年 7 月 3 日）

新任安徽省委书记韩俊：出身寒门，最懂农业

北上南下，创下多个“第一”

农政司知事

3月14日下午，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光军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韩俊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郑栅洁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韩俊此前担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这意味着学者型官员韩俊，从农业农村部北上吉林后，又南下安徽履新。

公开资料显示，韩俊，男，汉族，1963年12月生，研究生，农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所涉研究领域颇多，几乎涵盖了“三农”的主要议题；他还是一位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之一，曾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村里首位大学生

1963年，韩俊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的一个乡村民办教师家庭，是村子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早年间，韩俊在接受《中国青年》杂志采访时曾说，他小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贫困。他回忆：“我们家有五个孩子，再加上因为爷爷、奶奶去世得早，小姑姑、小叔叔和我们在一起，一家九口人，仅靠父亲一个月6块钱的民办教师工资生活。”

“一家人，天天就吃红萝卜，一锅一锅的，每人一碗，上面撒上些面。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中学开运动会，老师要求中午饭带干粮。干粮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用红薯加工成面，用面蒸成的饼子或窝窝头。我们家没有啊，也不能带着萝卜去学校吃啊。所以，我就回家吃饭，来回10里地，半路上就饿得走不动了。”韩俊说。

“十三四岁，我就有非常坚定的想法，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韩俊说，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会了一门手艺：用柳条编筐子、篮子，尤其是城里人喜欢用的篾笼子，“编一个能挣多少钱呢？3~5分钱，一个晚上我能编5~8个，一天能挣1毛5分钱。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一年级，每到冬天，我就干这项家庭副业”。

全校最刻苦的学生

初二时，韩俊首次照了相。他回忆：“那张照片，那个严重营养不良的小男孩，你会觉得那根本就不是我。直到上大学，我的身高才1.54米。”

上高一那年，国家刚刚恢复了高考制度，韩俊一心就要考大学，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当时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他说：“我的记忆力特别好，历史、地理基本上能考100分；政治，闭上眼睛能从第一课背到最后一课。上大学时，老师还经常把我的卷子贴在墙上，说，韩俊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

尽管当时有许多同学去报考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院，但韩俊却报考了山东农学院，理由是当时农学院好考，“没有其他想法，能上大学就行”。

1979年9月，年仅16岁的韩俊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与管理系。4年寒窗，4年苦读。1983年，这个在当时被公认为全校最刻苦的学生，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后考入西北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而由于成绩突出，学习两年后，韩俊被破格录取为该校的博士研究生。

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1989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韩俊入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成为杜润生的“弟子”之一。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2015年10月9日），原名杜德，出生于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人物。20世纪80年代，杜润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并连续5年主持起草“中央一号文件”，推广和完善被视为改变农村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在京辞世，享年102岁。韩俊写下了回忆文章《杜润生：搞清中国农村真问题》。

韩俊写道，他在西北农大读博士二年级时，一篇论文引起了杜润生对他的关注，杜润生亲自给陕西省和学校有关领导打招呼，协调他进京工作事宜。“就这样，有幸得到杜老赏识，而且在他的直接过问下，我才有机会走进慕名已久的‘九号院’，成为‘杜润生徒子徒孙’中的一员。每每念及杜老与我素昧平生，却给了我人生最大的帮助，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的心中都充满了无限感激、感动和温暖。”

自此，韩俊便与农业改革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995年，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年仅32岁的韩俊被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三农”问题专家，著作等身

2001年，韩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转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一职，完成从学者向准官员的转变，从学术研究向政策研究的转变，但研究领域仍然集中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在此工作期间，他曾对江西、广东、安徽、青海等地的县域调研，完成了《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课题，为政府制定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2008年10月，韩俊进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并继续兼任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2年后，他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韩俊所涉研究领域颇多，几乎涵盖了“三农”的主要议题，在粮食问题、土地问题、集体产权问题、城镇化等多方面都颇有建树。长期农业相关研究经历，给了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足够发言权。而自2004年起，作为国家智囊机构主要成员，他参与了包括中央“一号文件”在内的许多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的起草。韩俊曾表示：作为政策研究者，个人价值体现在反映百姓最真实要求的政策建议，被中央采纳，政策实施后又惠及百姓。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长期研究农业政策和农村发展问题的专家，韩俊先后出版了《调查中国农村》《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问题研究》《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等著作，还曾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于1985年开始设立和评选，每两年评选、颁发一次，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

2014年10月，韩俊由国研中心副主任调任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媒体刊发《“三农”专家韩俊履新中财办》一文，认为从国研中心到中财办任职，相当于从咨询机构到了决策机构，是更重要的工作岗位。

2017年4月，韩俊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8年3月，韩俊出任在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的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北上吉林

2020年11月，韩俊转岗吉林，出任吉林代省长、省长。

韩俊在吉林工作，依旧非常重视农业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吉林的农业问题。他说，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农业是吉林的突出优势，我们将全力实施农业双千工程，建设国家大粮仓、大肉库，全力放大农业优势。

建设农业强省，必须持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多样化食物供应能力，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吉林将加快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继续推进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开展国家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努力为国家多产粮、产好粮，在农业强国建设中体现吉林担当。

建设农业强省，还要下大力气做好“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畜头肉尾”增值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全链条升级。吉林正在大力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加快建设畜牧业强省，努力形成种养加一体、农牧渔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全方位开拓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吉林有汽车产业集群，韩俊非常关心汽车产业发展和旅游品牌建设。韩俊说：“吉林将强化创新平台支撑，建设国家汽车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跨领域、多学科联合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和‘卡脖子’技术，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吉林位于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森林覆盖率达45.2%……韩俊着力推动吉林打造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加快形成万亿级旅游大产业。他表示，“以农文旅融合为主攻方向，将吉林‘长白天下雪’‘22℃的夏天’等品牌推向全国，形成联动冬夏、带动春秋、驱动全年、四季皆有特色的全域全季大旅游发展格局。”并要求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高质量旅游产品，串点成链，叫响品牌，创建旅游休闲城市，形成联动冬夏、带动春秋、驱动全年、四季皆有特色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格局。”

韩俊在吉林任职期间，非常重视当地营商环境的改善。2023年初，吉林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大会。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强调，坚持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头等大事，营造人人重视营商环境、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时时处处都讲营商环境的良好生态，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推动吉林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突破。

南下安徽

3月14日下午，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韩俊发表讲话。

韩俊说，安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区位条件优越、人文历史厚重、多重战略叠加、科创能力活跃、人民勤劳朴实、勇于改革创新、红色底蕴深厚、产业特色鲜明、资源禀赋良好、交通四通八达，是一个富有魅力和充满希望的地方。接过安徽省委书记这副沉甸甸的担子，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要坚决确保安徽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推动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

和党中央大政方针政策在安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全方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融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人民群众新期待尽心尽力为民造福，始终把守好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当好人民的勤务员，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坚决反对和防止“圈子文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要坚持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围绕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充分发挥省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形成齐心协力干事业的生动局面。

本届省委要保持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创新性，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既定部署。作为省委班子班长，我将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始终做到“忠、专、实”，对党忠诚，专业专注，求真务实；始终做到“勤、正、廉”，勤勉尽责，弘扬正气，廉洁奉公，持续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更加壮阔、更加精彩、更加美丽的安徽篇章。

韩俊履新后，“带领安徽更进一步”“专家型官员”等成为网络声音的热词。舆论对此充满期待。

韩俊同志简历：

韩俊，男，汉族，1963年11月生，山东高青人，1989年5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西北农业大学（现更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89.05—1989.12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干部

1989.12—1990.03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990.03—1990.12 在陕西商洛地区扶贫办挂职锻炼

1991.01—1992.03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代主任

1992.03—1996.07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编辑部主任、副总编、社长

1996.07—200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2001.03—2008.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其间：2003.07—2003.09，参加中组部清华哈佛公共管理第二期高级培训班；2006.03—2007.01，参加中央党校第22期一年制中青班）

2008.10—2010.1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部部长

2010.11—2014.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其间：2012.03—2012.05，参加中组部国防大学国防战略研究班；2012.07，参加中组部剑桥大学企业管理高级培训）

2014.10—2017.04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其间：2017.02—2018.02，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

2017.04—2018.03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18.03—2020.11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其间：2020.04，任农业农村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2020.11—2021.01 吉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副省长、代省长

2021.01—2023.03 吉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

2023.03— 安徽省委书记

（来源：江南智造总局、聊时局、新华社、人民网 等，2023年3月26日）

韩俊履新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

曾得“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赏识

上观新闻

今日消息，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农业农村部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韩俊同志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

韩俊此前任安徽省委书记。今日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决定：梁言顺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韩俊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官方简历显示，韩俊，男，汉族，1963年12月生，山东高青人，研究生，农学博士，研究员，中共党员。韩俊是“三农”领域资深研究者，为学者型官员。他曾自述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杜润生被尊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2015年10月，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撰写回忆文章，纪念逝世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原主任杜润生。韩俊在文中透露，“有幸得到杜老赏识，而且在他的直接过问下，我才有机会走进慕名已久的‘九号院’，成为‘杜润生徒子徒孙’中的一员。每每念及杜老与我素昧平生，却给了我人生最大的帮助，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的心中都充满了无限感激、感动和温暖。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刻，有幸得到这样一位伟人的指导和关怀，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荣幸。”

在文章中，韩俊还提出，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头戏，当前，抓好农村改革，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好方向，防止农村改革走偏跑调，避免犯不可挽回的方向性错误。农村改革要破解的难题很多，要把这项工作顺利推进下去，我们就要牢记杜老教诲，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漠视农民、不顾农民冷暖，要心中始终装着农民，尊重农民意愿，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韩俊曾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等职。

2014年10月，韩俊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于2017年4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8年3月，韩俊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后于2020年11月出任吉林省代省长，2021年1月起任吉林省省长。2023年3月，韩俊出任安徽省委书记。他是第二十届中央

委员。

据安徽日报消息，从2023年3月14日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到6月28日离任，韩俊在安徽工作了473天。期间，韩俊走基层、进农户、察民情、入企业、解难题，在安徽留下了一串串足迹。

在安徽工作期间，韩俊提出把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作为旗帜性抓手。2023年3月18日，韩俊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调研，这是韩俊履行安徽后调研的首所大学。韩俊指出，安徽将一如既往地秉持“怎么支持科大都不为过”的理念，把科大的事作为重中之重，对科大的诉求有求必应，扎实做好服务保障。

今年2月27日，韩俊在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做好新时代科技创新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位置，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建设科技强省的责任感使命感，让科技创新成为安徽厚积薄发最坚实的底座、动能强劲最有力的支撑、大有可为最可靠的保障，更好发挥经济增长极、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的作用，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加快建设自立自强的科技强省，排在安徽建设“七个强省”的首位。2023年，安徽区域创新能力跃居全国第7位、连续12年位列全国第一方阵；创新环境跃升至全国第3位。合肥主要创新指标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方阵，跻身全球科研城市第16位。安徽全社会研发投入1152.5亿元，总量跃居全国第10位，研发投入强度2.56%，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居全国第七位。

此外，韩俊还格外关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在宣布任命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韩俊表示，接过安徽省委书记这副沉甸甸的担子，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全方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融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2023年8月，韩俊在第15期《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文章强调，安徽全省域加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家庭，是安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借上长三角的“东风”，搭上一体化的“快车”，融入得越深入，获得的红利就越大；链接得越紧密，发展的势能就越强。我们积极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坚持上海龙头带动，学苏浙之长，扬安徽优势，主动靠上去、精准接上去、全力融进去。

长三角一体化是安徽发展最大机遇、最大势能、最大红利。2023年6月，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合肥召开。安徽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建起来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搭起来一批重大合作载体，立起来一批重大合作机制，推进一体化各项工作走深走实。2023年，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亿元以上项目3789个，实际到位资金同比增长7.2%。

(2024年6月28日)

跨越世纪的印记

——114岁新四军老战士施平手印采集 见证不朽抗战荣光

新四军纪念馆

近日，新四军纪念馆赴上海，采集新四军老战士施平同志手印。

施平同志原名施尔宜，1911年11月生于云南大姚县。施平同志的一生，是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的一生。

施平同志中学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26年于昆明投身大革命，1931年秋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学生抗日会主席。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施平同志任浙大学生会主席、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领导杭州全市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并任全国学联执委特别委员会主席。1938年1月，施平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浙东南特委宣传委员、云和县工委书记，在云和县利用公开身份筹办《云和快报》并先后发表了《铲除汉奸》《本县没有爱国健儿吗？》等十数篇文章。

1939年冬，施平同志调往桂林，在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工作，曾秘密到上海担任华东沦陷区新闻工作站负责人、香港分社记者、采访部主任。1941年8月，施平同志进入新四军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在此期间，受新四军军部委派，护送邹韬奋到淮南军部。1946年至1947年，施平同志任南通县委书记、县警卫团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施平同志曾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是新中国北京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施平同志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为党和人民事业英勇奋斗，期颐之年仍心系党史宣传教育，深厚的爱党之情令人感佩。如今施平同志已114岁高龄，是健在的亚洲最年长男性和全球第三年长的男性，本次手印采集，不仅是对施平同志革命人生的见证，更是对抗战精神的传承。

扬帆再起航，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新四军纪念馆将进一步用好新四军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新四军的故事，激励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少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坚定跟党走，为实现伟大梦想而不懈奋斗！

(2024年6月2日)



施平同志手印

论乡村振兴中的农民增收

张红宇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2021年农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起点上，农民增收形势怎么样？下一步政策重心聚焦哪里？如何确保农民持续较快增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需要更加强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目标做了进一步明确。我的理解是，在后小康时代，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战略选择。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做到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动共同富裕，聚焦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到小康是全面的小康还是有“短腿”“短板”的小康，是高质量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小康。只有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才能建成惠及广大农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小康社会。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有效途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经济新常态下，近几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高速增长难以保持，需要更多依靠消费。2012-2018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54.9%提高到76.2%，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43.4%下降到32.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1.7%下降到-8.6%。从扩大内需来看，农村有巨大空间，几亿农民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能够释放出大量的消费需求，前提是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为2:1左右。差距就是发展空间，就是增长潜力，扩大内需战略能否顺利实现，关键在于农民收入能否实现持续快速增长。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动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世界达到中等收入标准的101个经济体中，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一些拉美国家长时间难以成功脱离“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贫富差距过大，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我国人均GDP刚刚突破1万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还有一定距离，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稍有不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可能出现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不利局面。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一方面，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需要加大农业农村投入力度，强化农村产业基础，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立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些措施有助于从根本上破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另一方面，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也有利于提升农民自身素质和发展能力，无论是进城还是留乡，都可以有效发挥人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作用，让城乡都充满人气和发展活力。

总之，从历史发展到现实需要，从经济变革到社会发展，都需要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促进农民增收的因素和动力

农民收入包括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因此收入增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但后半段出现了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90年代以后农民收入进入稳定较快增长时期，除了得益于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也得益于农业结构调整、粮食价格放开、劳动力转移加快、财政支农支出增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从增收贡献来看，可以把这一时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家庭经营增收为主。大致在1990-1997年左右，这一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速达到6.6%，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5%，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9.6%。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占纯收入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增收贡献率平均为68.0%；工资性收入贡献率只有26.8%；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贡献率合计只有5.2%。

分析这一阶段的增收动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主要因素。进入90年代，国家连续提高粮食统购统销价格，1994年起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1997年农产品价格指数比1989年上涨114.8%。受价格利好等因素影响，农作物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大幅增长，1997年农作物播种面积比1989年增加5.1%，粮食总产量增长21.3%。农产品的量价齐升，带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较快增长。

第二阶段，以工资性收入增长为主。大致在1998-2003年左右，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进入徘徊期。农民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仅有4.0%，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年均实际增长0.9%，工资性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0.3%，转移性收入年均实际增长3.5%，财产性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8.8%。家庭经营收入仍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占60%左右，但贡献率仅有12.9%；而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升至75.9%，成为这一时期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贡献率合计为11.2%。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工资性收入年均实际增速仅比上一时期提高0.7个百分点，但贡献率却提升近50个百分点，原因主要是家庭经营收入增长近乎停滞。

工资性收入成为促增收的重要因素，与这一阶段国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针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取代了之前的控制流动，同时积极推进就业、社保、户籍、教育、住房、小城镇建设等多方面配套改革，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规模达到9820万人，比1997年增加27.2%。

第三阶段，多轮驱动农民增收阶段。大致在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进入持续较快增长阶段。基于农民收入同口径比较，可以将这一时期再分为两个子阶段。一是2004-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速为9.0%，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年均名义增速分别为

5.6%、11.8%、18.9%、12.0%。二是2013-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年均名义增速分别为6.6%、10.3%、12.3%、11.6%。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工资性收入的增收贡献率达到40%以上，还是农民增收的大头；家庭经营收入贡献率在25%以上，仍是农民增收的基石；转移性收入贡献率上升到27%左右，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财产性收入贡献率为3%左右，是农民增收的有益补充。

这一时期，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密集出台，为促进农民增收带来重大利好，粮食连年丰收，农产品量价齐升局面再次重现。特别是农民工规模和工资收入双增长为农民持续增收奠定了基础，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外出就业农民工总量比2008年增加24%，外出农民工月收入水平增长2倍。同时，国家脱贫攻坚战略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扎实推进，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2013-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0.0%，比全国农村平均增速快2.3个百分点。

农民增收面临复杂的新形势

农民增收形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实现“十七连快”，过去十年农民收入增速连续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020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7131元，较2010年翻一番还多，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2.56:1，比2019年缩小0.08，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当前，农民收入水平已经站上新的历史起点。今后一段时期，影响农民增收的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将对农民收入走势产生深刻影响。我简单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有制约，国民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带来一定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从根本上讲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宏观经济形势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不可低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治理整顿、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回落，农民收入增速也随之显著放缓。过去几年，我国农民收入由快速增长转向较快增长，固然与基数变大有关，但也与经济增速放缓紧密相连。据测算，2010-2019年农民收入增速和GDP增速的相关系数高达0.87。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由前些年的10%以上回落到7%以内，同期农民收入增速也由11.4%下降到6.2%。可见，稳定增长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农民增收的主基调。

二是新动力，新型城镇化、农村改革和城乡融合发展将为农民增收带来历史机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充足人口红利的同时，也为农民收入创造了强劲增长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4%，二者相差16.2个百分点。如果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70%，还将增加约1.4亿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生活，城镇化提升空间还很大。与此同时，目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净收入仅占2.3%左右，主要原因是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财产权利不完整、权益不平等，束缚了财产权益的发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民的集体收益分配收入仍有很大提升潜力，截至2019年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总额高达6.5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为3.1万亿元。

三是有难点，传统农区和小农户将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难点和重点。基于我国特殊国情，以小规模农户为主体的经营结构将长期存在，单单靠农业收入让普通农户增收致富的难度很大。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数据测算，2018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明显偏低，仅相当于二、三产业的21.9%，且提升速

度趋缓；以 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由“十二五”时期的年均 9.3% 下降到 2016-2018 年的年均 6.3%。受此影响，农业收入增长困难，比重呈下降趋势。2013-2019 年农村居民人均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年均名义增速仅为 4.7%，低于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速 4.5 个百分点，占比从 30.1% 下降到 23.3%。从面上看，按照收入五等份分组，有大约 60% 的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低收入农户大多位于传统农区和欠发达地区，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既是农民增收工作的重点群体，也是难点所在。

当前，我国正处在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调整期，城乡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期，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转型优化期，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创新期。农民增收形势正在出现一些趋势性变化。首先，农民收入增速稳中趋降。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的超高速、80 年代后半期的快速下降、90 年代前半期的平稳上升、90 年代后半期的明显回落、本世纪前 11 年的中高速增长、2012 年以来又逐步回落。从增速变化看，当前已经进入一个下降通道，增速稳中趋降的势头已经显现，且大概率不是短期现象。其次，两大来源的增收贡献双双减弱。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民收入两大支柱，其增收贡献基本决定了农民收入走势。据我们测算，2014-2019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贡献率由 47.2% 下降到 41.8%，经营净收入贡献率仅保持在 25%-29%，少见地出现了两大收入贡献率同时走弱的情况。最后，政策调控难度日益加大。过去，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农产品和农村劳动力总体上供不应求，可采取的政策手段较多，促增产、提价格、增补贴、促转移、涨工资等政策都可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前，财政收入增速回落，农产品总体上供大于求，农民工供求匹配困难现象有所增加，农民增收政策创设难度越来越大。

从上述变化看，农民收入又到了一个关键转折期，增收的环境和动力正在发生调整，阶段性特征正在积累形成，对此需要高度关注。

农业产业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

农业兴则百业兴，百业兴则农民富。2020 年是重要而特殊的年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在中国已取得战略性胜利，但在全球仍在持续蔓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增加，这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带来巨大影响。基于这个大背景，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作用日益凸显，但有两组数据值得关注和析。

第一组数据，我国是世界最重要的农产品产出大国。2020 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六年超 6.5 亿吨，达到历史高点。粮食人均占有超过 470 公斤，不仅远超世界人均占有 350 公斤水平，也超国际社会公认的人均占有 400 公斤的粮食安全线。大米、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的国内自给率平均在 97% 以上，“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发展战略在实践中落实得很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取得辉煌成就，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总量一直呈线性增长之势，产业、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0 年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超过 23.5 万亿元，加工业与农业产值比达 2.3:1。全国农业生产托管面积超过 15 亿亩次，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超过 44 万个，服务小农户超 6000 万户，在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组数据，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大国。2020 年粮食产量达历史新高，但同期进口农产品依存度也达历史新高。包括大豆在内的农产品进口量达 1.43 亿吨，同比增长 28%。其中大豆进口超 1 亿吨，比 2019 年的 8851 万吨增长 13.3%，占需求总量的 90% 以上；肉类进口量增长了 60.4%，加大了

农产品供需平衡难度，紧平衡态势仍将持续。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大国，按全口径农产品进口数量观察，农产品进口对外依存度高达30%以上。

从两组数据对比分析来看，可以得出两个判断：一是农业在解决中国人吃饱问题的同时，对农民“钱包”鼓起来的伟大实践也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二是必须坚持“两个资源、两个市场”的农业对外开放方针，充分认识到国际形势的变动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影响重大，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忧患意识。总之，要把握正确的农业产业安全观，牢牢把握农业产业安全的主动权，不仅有助于稳住农业基本盘，更好地应变局、开新局，也有助于保持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为农民就业增收创造良好环境。

促进农民增收需要把握的关键问题

农民增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措并举、同向发力，体现“四个注重”。

一是注重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制定农民增收战略。从发展实践来看，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国际上普遍加大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支持力度以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如日本从1961年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2011年前后，我国江苏等一些省份也制定实施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明显成效。党的十八大提出居民收入翻番目标，成绩更是有目共睹。因此，农民收入增长态势，与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高度相关。从发展阶段看，当前我国已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并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对于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大等问题，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要坚持把农民增收置于“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继续推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农民倾斜，促进农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

二是注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关系。工业化早期阶段，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决定了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劳动力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上升，2012年达到43.6%，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随着城镇化加快推进，进城落户或常住农民的收入不再被统计为农村居民收入，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在达到一个峰值后逐渐下降。为此，要避免农民收入增速徘徊甚至下降，必须推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加快增长。一方面，要利用专业化带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使务农收益水平达到甚至超过外出务工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市民化，促使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均衡发展。

三是注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向农民倾斜。应加强农民增收的顶层设计，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在初次分配领域，应建立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引导农产品价格合理调整，使其反映要素稀缺程度和生产成本。同时，建立农产品价格和低收入群体生活补助联动机制，提高各方面对农产品合理涨价的容忍度。在再分配领域，应出台差别化的补贴政策。新增农业补贴向主产区倾斜、向山区牧区渔区垦区倾斜、向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倾斜，既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作用，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又进一步强化政策激励效应，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四是注重通过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农民增收的外部环境。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浙江、上海、苏南等地，都是城乡融合做得比较好的地区。要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健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需要从三个层面入手。一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二要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三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相关政策上应在哪些方面着力

促进农民增收，需要立足我国实际，加大支持力度和创新支持方式，进一步完善农民增收政策，需要在以下几方面深入探讨。

一是突出增收政策的差异性。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对农民增收有一般性的支持政策，而且对欠发达地区和小农场还有专门的扶持措施。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增收政策中普惠性政策较多，差异性政策较少。现阶段，农村低收入问题已经越来越集中到传统农区和普通农户。但从未来看，大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激活农村资源资产，潜力最大、最有希望的仍然是主要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郊区等，广大传统农区和普通农户的增收问题将会愈发突出。因此，应适时调整农民增收政策，更加鲜明地指向农村低收入群体，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将有限的政策资源更多地向增收困难区域和群体倾斜。

二是突出财政支持方式的引导性。以往，财政主要是通过提价、补贴等方式直接带动农民收入增长，但这种“直给”的做法已难以为继。从发达国家实践看，为摆脱预算压力，精巧设计财政支持方式、放大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越来越成为通行做法。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人均农地资源有限，如果单纯依靠直接补贴来促进农民增收，更加难以摆脱补不起、补不到位的“厨师困境”。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利用市场机制吸引更多金融资本和其他社会资金共同促进农民增收，应当成为下一步政策创设调整的重要方向。

三是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性。目前农民收入四大来源中，除部分转移性收入外，都是由市场决定的。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市场。近些年来，随着各种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新要素的不断进入，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新机会；一些地区积极探索激活农村产权，通过土地入市、股份合作等，为农民带来了长期稳定的收益。市场拓渠道、政策给空间，应当成为农民增收工作的基本原则。为此，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放宽政策限制、规范市场运行、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更大力度地推进改革，更加精巧地创设政策，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充分释放、有效发挥。

四是突出社会保障的城乡融合性。从目前情况看，短时间内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面临很大困难，但是通过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显著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尤其是能使低收入群体感受到最直接的实惠和真正的生活保障。在城乡之间、农村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几年，国家逐步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城乡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但农村社会保障标准和水平与城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下一步，应将社会保障摆在更为优先的位置，按照“完善制度、统一政策、提高水平、加快并轨”的原则，加快健全多层次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有稳定的生活预期，不致因收入波动而陷入困顿焦虑。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1年第4期）

如何破解“大国小农”之困

张铁军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业现状。据统计，在我国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小农户约2.1亿户，占农业经营户总数的98%以上，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然而，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模式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存在突出矛盾，即“小农”经济形式导致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如何破解“大国小农”困境，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已成为当前农业政策和农村发展的重大课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要统筹支持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政策扶持、服务引导、利益联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小农户经营是我国当前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基本力量，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直接关系到提高我国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重要作用。

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需要构建一个全面、多层次、宽领域的政策支持体系，以促进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变，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首先，土地政策的创新与完善是关键环节。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地经营权流转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重点。完善土地流转市场，鼓励和引导小农户将土地经营权通过流转、入股等形式集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相关政府部门应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确保小农户的土地权益不受侵害，增强其参与现代农业发展的信心和动力。其次，技术支持与服务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石。现代农业离不开科技支撑。建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组织农技培训，提供科技咨询服务，使小农户能及时获取现代农业技术，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在智慧农业和生态农业等领域，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小农户可以更好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智能化和绿色化水平。再次，金融支持与创新是推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设立农业支持基金、提供贴息贷款、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小农户的金融产品，增强其融资能力。创新农业保险产品，为小农户提供风险保障，降低其生产经营风险。最后，市场准入与保护是政策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提升小农户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通过搭建电商平台、组织农产品展销活动等形式，为小农户的产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保障产品顺利销售。

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过程中，科技创新与应用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科技进步不仅能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还能通过提高小农户的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促进其与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

首先，智慧农业的推广应用至关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农业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小农户可以引入智能农业设备和信息管理系统，如智能灌溉系统、农业无人机、大数据分析平台等，实现精准农业生产。这不仅提高了小农户的生产管理效率，减少了资源浪费，还提升了农作物

的品质和产量。

其次，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小农户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使用抗病虫害的转基因作物种子、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等，小农户能有效减少农业生产中的化学品使用，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同时，生物技术能帮助小农户改良品种，提高农作物的适应性和抗逆性，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最后，农业技术培训与知识普及是科技推广的基础。科技推广和应用离不开相应的技术培训和知识普及。通过组织农业技术培训班、线上线下农业知识普及活动等，帮助小农户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提升科技应用能力。在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下，小农户能更快地学习和应用新技术，促进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市场机制的有效运用，不仅为小农户提供了更广阔的销售渠道，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为其融入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活力。首先，建立农产品销售平台是实现市场对接的重要步骤。相关部门通过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农贸市场等方式，为小农户提供稳定的农产品销售渠道。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直接链接到消费者，提高销售效率和小农户的收益水平。其次，品牌建设与质量提升是提高小农户农产品市场认知度的有效途径。政府和相关机构应提供品牌建设指导和支持，帮助小农户建立自身品牌。通过质量认证、有机产品认证等方式保证农产品品质，增强消费者对小农户农产品的信任度，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农业产业链的整合是实现产业升级和增值的重要环节。建立“农户+合作社+企业”的合作模式，将小农户生产的原料供应给下游加工企业，不仅能够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链，还可以使小农户分享产业链上游的附加值，进而提高其经济收入。此外，增强小农户的市场适应能力是确保其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稳定增收的重要因素。通过提供市场信息服务、培训小农户进行市场分析和预测、传授其灵活调整生产策略等方式，可以帮助小农户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优化其生产计划和销售策略。

（作者：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6月26日第2版）

稻米种植的全球史

张瑞威

稻米是现代人类的主要粮食。既然农作物相同，种植方式和农家生活便自然相近，包括在每一个春天，地球上所有国家的种植稻米的农民都在焦急地等待同一事情——第一场大雨。天降甘霖，农民便可以将秧苗移插到大田里了。

哈蒙德（Winifred G. Hammond）把这种心情，通过虚构的人物活灵活现地表达了出来。她说，如果你到了印度，你可能见到辛格先生正在巡视他的稻田。稻田的泥土早已被太阳晒得干涸到即使犁头也翻动不了的地步。辛格先生抬头望着灼热的天空，喃喃自语：“唉！什么时候才下雨？只要下雨，我便可以立即插秧了。”他的太太和儿女待在泥草盖搭而成的屋子内。在4、5月时，热浪逼人，除非在早上和晚上，大家都避免进行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当辛格先生进屋，辛格太太问道：“看不看得到云？”他摇了摇头，说：“还没有。让我们一起祈祷下雨吧！”

在印度数千里外的韩国，蔡先生有着类似的心情。他走到门口，打开门，向外面地上的雪张望，他想，雪减少了，很快便会消失了。他关上门，对太太说：“我想我们可以明天移秧，今年的春天来得迟，已经是5月中旬了。”蔡太太张大眼睛说：“每天夜晚仍然会结霜，把秧苗都冻住了。”蔡先生回答：“就是这样啊！我现在每晚都出去在培田上洒水保温，好让秧苗不会冻坏。每天早上又把水放走，好让阳光的热力不会被水减弱……”

在菲律宾群岛，克鲁兹先生跟他的孩子们说：“今日带上那头懒惰的水牛，将它河中洗擦干净，明天它要工作了。到时我会用一根绳子穿过它的鼻孔，驱使它在稻田上走呀走。已经下雨了，是时候移秧了。”孩子们都很高兴，嚷着明天跟爸爸一同下田。克鲁兹笑着说：“可以，可以，我们一起去，到时我牵引水牛在田上拉着耙来回走，你们两个可以骑在牛背上呢！”

不止印度、韩国和菲律宾群岛，还有中国、缅甸、泰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只要是种植稻米的地方，农民的日常担忧都大同小异。他们最担心天气——春天会否迟来抑或太冷？雨水会否太少或太迟？会否有洪水把农作物冲走？……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和经济被认为是两个独立且不相关的概念。即使没有人否定农业的重要性，农业也往往被排除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讨论之外。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强敌环伺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民国政府认为国内的粮食生产尚不能自给自足，一旦开战，粮食不足的问题，便会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政府于是将目光投向农业改革，邀请了卜凯等外国农学专家来到中国，帮助开发高产的水稻和小麦品种，以求养活更多的人口。尽管政府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却认为农业无关乎国家的现代化。对政府来说，现代化是以工业为基础的，尤其是重工业。

在国策上追求粮食自给自足，不等于中国的农村是自给自足的单位。陶尼（Richard Henry Tawney，

1880-1962) 在 1932 年的研究指出, 中国农民对农作物的选择, 并非单单为了果腹, 更重要的是针对市场所需。在山东, 农民尽量将小麦卖出, 而自己吃较廉价的高粱, 这个情况也见于四川省成都市。他又利用卜凯在中国各地调查的共 2866 个农场的的数据, 得出 53% 的农产品是卖到市场的, 其中包括超过 1/3 的水稻, 1/2 的小麦、豆类和豌豆, 2/3 的大麦, 以及 3/4 的芝麻和蔬菜等。陶尼的结论是, 在中国, 无论是棉花、茶叶、烟草和丝绸等经济作物, 还是粮食作物, 主要都是为了出售而种植的。

西奥多·舒尔茨 (Theodore Schultz, 1902-1998) 也质疑农民对市场活动一无所知的说法, 问道: “读写能力意味着什么?” 他认为即使农民是文盲, 也不等于他们对投资和回报缺乏敏感度。舒尔茨指出, 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甚至那些被西方视为落后的地区, 农民都会对市场做出反应。例如, 中美洲危地马拉的帕纳哈切 (Panajachel) 地区, 地处偏远, 以耕种为主, 但从来不是自给自足地孤立地存在, 而是紧密地融入更大的市场。该地的农民勤俭持家, 也精于交易。他们将农田租出, 或将庄稼卖掉, 换取金钱, 好让他们在市场上换取家庭日用品或农具。美洲原住民也是如此, 他们会在自己耕作与做他人雇工之间做出理性的比较。同样地,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印度旁遮普 (Punjab) 邦的棉农, 与他们在北美的同行一样, 会因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做出生产的改变。

罗友枝 (Evelyn Rawski) 表明, 市场状况甚至影响了一千年前中国农民对农产品的选择。占城稻这种耐旱的早熟稻品种, 在 11 世纪前期已经被引进中国, 促成了华南地区如广东和福建的双季稻种植。虽然占城稻有种种好处, 这一新的稻米品种却无法打入江南的农业生态系统。苏州的农民还是宁愿继续种植粳米。这种本地稻米虽然种植时间长、产量低, 却在市场上得到了更好的回报。

自 16 世纪开始, 中国水稻的产量有了长足的增长, 其背景不是人口压力, 而是海上贸易。首先是日本发现银矿, 导致中国东南沿海省份 (尤其是浙江和福建) 的商人纷纷利用帆船, 满载丝绸和瓷器, 开到长崎, 以求交换白银。这突如其来的蓬勃繁荣的私人海上贸易, 突破了朝贡贸易的常规, 被明朝禁止, 而海商被视为私客甚至海盗。但利益当前, 帝国的禁令无法阻止白银贸易。占据马六甲海峡的葡萄牙商人, 马上占据澳门, 充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中介人。当时中国白银的来源, 除了日本, 还有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当地不产白银, 但当 1565 年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后, 便利用这个港口发展对华贸易, 出口他们得自美洲新大陆的白银。到了 18 世纪, 日本的白银矿藏已经所余无几, 而西班牙的海洋帝国也走向衰落, 但英国东印度公司乘时接棒, 把公司从欧洲赚取得来的白银运到中国广州, 交换茶叶。

明清的长程米粮贸易是从蓬勃的海上贸易中发展出来的。在白银贸易下, 中国东南沿海城市都成了国内丝绸、瓷器和茶叶出口的总汇, 也是外国白银进入中国的港口。城市的经济规模扩大, 不断从本省农村和邻近省份补充劳动力。无论是本省的, 或者新到来的人口, 都变得比以前富裕。他们逐渐放弃吃粗粮的习惯, 餐桌上改放更有体面的稻米。正如安部健夫所言: “只要把一般人的想吃更好吃的东西的欲望看作问题, 米谷就的确是不够的。” 邻省的农民, 针对这个庞大的新兴市场, 纷纷投资和发展种植廉价稻米, 再利用大江大河转运到这些沿海商业城市。在这个发展势头下,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米谷贸易便因而蓬勃起来。

中国对大米需求的增加和发展是与世界其他地方同步发生的。1670 年英国殖民者在北美洲东南沿岸的南卡罗来纳建立查尔斯镇 (Charles Town), 并开始在当地种植稻米, 作为从欧洲新来移民的粮食。不过由于缺乏经验, 以及资源投资有限, 早期的稻米种植点多选择在不受涝害影响的高地。缺点是收成不多, 仅够应付本地的需求。随着查尔斯镇的发展, 以及更多拥有经验的欧洲稻农的到来, 在 18 世纪

头十年，稻米已经成为南卡罗来纳的最主要农作物。不过南卡罗来纳稻米的真正发展，是1731年英国国会容许从南卡罗来纳出发的英国货船装载稻米到达欧洲。这个弛禁命令，让南卡罗来纳的农民看到了潜在的庞大的海外稻米市场，开始花费巨额金钱和大量人力，在低地修筑灌溉系统，种植水稻。果然，1731年后，南卡罗来纳的稻米出口持续增长，而1760-1780年欧洲的农业失收，更把这个美欧的长程稻米贸易推到新的高峰。为了投入更多劳力、增加产量，南卡罗来纳从西非输入大量黑奴。1770-1775年，到达南卡罗来纳的非洲黑奴，40%都是从事稻米耕种的。在1785年一艘抵达查尔斯镇的从事黑奴贩卖的货船上，船主广告中便写着船上的黑奴都是勤力和精于耕种稻米的。

供应欧洲市场的也有来自印度孟加拉（Bengal）地区的大米。1820年前，孟加拉地区已经成为欧洲主要的稻米进口地区。1912-1913年，孟加拉地区的大米出口超过一千万英担（cwt），约相当于五亿千克。进口国家和地区包括锡兰、英国、法国、德国、毛里求斯、东非、南美、西印度群岛和阿拉伯等。不过，并非所有的孟加拉大米都能达到市场要求的质量。孟加拉大米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叫 aush，是耐旱的早熟稻米品种，4月至5月播种，生长期只需100-120日，7月至9月便有收成。不过 aush 质量低下，不大能在市场出售，所以多是作为耕种者自己食用的品种。第二种叫 boro，在潮水涨落的地方种植，12月至2月播种，4月至5月收成。与 aush 一样，boro 同样是粗粮。第三种是 aman，是秋冬品种。aman 的特点是它需要悉心栽培，不过在市场上，与前两种品种比较，aman 的质量是最高的，也最受市场欢迎。

总的来说，自16世纪开始，在地球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包括中国的华中和华南地区，稻米的产量大大增加。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不应单纯用人口压力来解说。稻米的商品化，是愈来愈多人放弃杂粮的表现；而食用稻米，不单是因为口感问题，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表现。所以，1958年的广州人，即使在困难的日子里，也不大愿意吃番薯。同样的情况是，在2010年，当印度尼西亚政府呼吁人们多吃稻米以外且较为高产的碳水化合物（包括玉米、西米、木薯、番薯、土豆等）时，印度尼西亚社会有很大的反应。一个23岁的印度尼西亚学生对记者说：“我早餐、午餐和晚餐都是吃米饭的。”“如果我不吃米饭，便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吃过，我还可以吃什么东西？”记者很清楚问题的关键——在传统的印度尼西亚社会中，稻米是尊贵的餐桌主粮，不像木薯那些根茎类杂粮带着贫穷的含义。

（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学士，英国牛津大学硕士、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授、中国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比较及公众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来源：《想吃好的：明清中国的稻米种植和消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从我国食物自给率的变化看构建农业新发展格局

杜 鹰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参加这次研讨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从我国食物自给率的变化看构建农业新发展格局》。这是我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今年的一个课题的成果，我抽了一些要点给大家作一个报告。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从“吃不饱”到“吃得饱”，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历史性变化。从现在来看，我们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和供给侧的一些结构性变化，我觉得赋予了我们国家粮食安全一些新的含义，也就是国家的安全显得越来越重要。我觉得食物安全问题需要我们在这个阶段额外予以关注，因为它不仅是治国安邦的一件头等大事，也是我们今天研讨的共同富裕的一个物质基础。所以我今天就谈几点看法，准备讲三个问题。

一、我国食物自给率的变化情况

今年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 20 周年，20 年来，我们的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发展速度非常快。2000 年-2020 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从 260 多亿美元增长到去年是 2400 多亿美元，大概增加了 9 倍。我们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总额在全球的排名从第 12 位上升到第 2 位，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出口额虽然也在增长，但是进口额增长的速度更快，因此大体到 2004 年，形成了贸易逆差，中国从此前的农产品净出口货转而成为净进口货。到 2009 年以后，逆差不断扩大，到去年是 946 亿美元，到今年上半年的逆差就已经是 700 多亿美元。

分品种看，谷物的自给率一直保持在 97% 以上，进口多的是油料、大豆、糖类、肉类、奶类这些高蛋白食物。所以各位，我们现在缺的不是谷物，缺的是高蛋白食物。所以我为什么说食物的安全是这个阶段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用两种方法计算了我国总的食物自给率的变化，分品种的可以算它自给率，但是我们需要得到一个总的食物的自给率，这样就要把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统一换算为热量。或者我们通常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耕地面积折算，我用两种方法都算了一个账。净进口农产品，就是扣除出口以后的净进口虚拟播面，国内农作物总播面，净进口虚拟播面占国内总播面的比重，最后是食物自给率。2000 年的时候我们食物自给率是 101.8%，到 2020 年，下降到 76.8%。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用热量，热量是蓝线，橙色的是蛋白质，灰色的是脂肪，黄色的是碳水化合物，也是从将近 100% 下滑到现在的也是 76% 点多。用两个方法计算结果是一致的，入世之初，我们食物的自给率大体是 100%，而 20 年后的今天，我们的食物自给率已经下降到 76% 左右。

我们又比较了中国的食物自给率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作了一个比较。韩国的食物自给率从20年前的50%下降到现在的44%左右，日本的食物自给率或者叫热量自给率从40%下降到现在的36%左右，台湾地区大体都在35%上下波动。我们的自给率虽然很高，但是你看我们的下降速度要比它们快得多。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大家很关心到2035年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中国的食物自给率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样我们用黄季焜的一个预测，他做了14种食用农产品到2035年的产量预测，我们利用他的研究结果，把它换算为总的热量自给率。结果到2035年，我们总的热量自给率有可能和目前的76%进一步下降到65%左右，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结果。分品种来看，到2035年，小麦、稻谷的自给率可以保持在96-97%。值得关注的玉米，玉米的缺口会持续扩大，缺口从目前的1130万吨扩大到3500万吨，自给率从95%下滑到90%。大豆的缺口持续扩大，自给率仍然在17%上下。猪肉的自给率在玉米进口量增加的情况下，可以维持在95%。但是牛肉的自给率会从76%下降到73%，奶类的自给率从67%下降到58%。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前20年和后15年中国食物自给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二、中国农业面临的真正挑战

日本经济学家认为，土地资源稀缺国家的农业会先后碰到三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即粮食不安全、部门收入不平等、高收入阶段农业比较优势下降带来的食物自给率下降，他将这三个问题分别称之为粮食问题、收入问题和食物自给率问题。并指出，前两个问题早已被论证过，他认为现阶段对日本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食物自给率的问题。

我们以为，他的论断有助于我们理解人多地少国家农业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也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农业也先后碰到了这样三个问题，而前两个问题在我看已经解决过或基本解决，粮食绝对短缺问题在90年代中期就解决了，部门收入不平等也就是所谓从农业提取积累的问题到新世纪之初已经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最要命的需要我们农业上做出最大努力的，就是如何保持一个合理的食物自给率的问题。

为什么食物自给率这20多年来持续地下降？背后的原因各位农林界的专家学者都很清楚，就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我们的农产品的竞争力在下降。下面一张图是给出了各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这里我们用的是贸易专业化指数TSC，TSC等于或接近于1就是有比较优势，负1是绝对的比较劣势。我们中国的图是这张图，你看所有的散点都集中在负1，而其他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它的散点靠外圈，就是周边，有比较优势。里面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呢？这20年来，我们这个图是越来越往中心点收缩，原来有比较优势的现在变成弱比较优势，弱比较优势的变成弱比较劣势，弱比较劣势的变成比较劣势，是这么一个情况。

三、构建农业新发展格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的自立自强，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复兴大业，是我们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须臾不能放松的大事，也是必须花大气力才能办好的大事。从大的思路来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是要着眼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点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要立足国内，千方百计把我国的食物自给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什么叫合理的水平？我们农林界是需要很好地研究一下这个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

利用两个市场，但必须有一个安全线，超过了以后，就要亮红灯。要明确重要能源资源国内生产自给的战略底线，一个安全线，一个战略底线，超过了就要亮红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重要指示，同时我们根据中办、国办 2019 年 55 号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我国重要农产品的保障战略的指导意见。

又考虑其他因素，我在这里提出我们能不能在未来一个时期，比如到 2030 年，2031 年是中国人口峰值，我们的食物自给率应努力保持在 70%以上，不能任由其下滑，不能重蹈日本、韩国的旧辙，否则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就会在现代化中丧失主动权。所以在新格局的国内大循环上，怎么样努力地把我们的食物自给率保持在 70%以上，我们过去提过粮食的自给率是保持在 95%，后来因为大豆进口多了，大豆又属于粮食类，实际上已经突破了 95%。后来我们就提出叫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现在看玉米也有可能要进一步地往下跌，所以将来考虑口粮小麦、稻谷我觉得应该保持在 100%左右，日本、韩国现在的大米都是 100%以上。玉米、谷物要保持在 90%以上，而整体食物就是热量自给率要努力保持在 70%以上，看看这样提行不行？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

国内这样，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人多地表水更少了，肯定有一些缺口需要靠国际市场来填补。所以要主动地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特别是要打造安全可靠的食物供给链，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好工作。

最后，国内怎么能够把食物的自给率保持在合理水平？我基本的看法，在土地、水资源等等其他农业的自然资源一定的条件下，能够有效稳定和提高我国食物自己里的变量是什么呢？种业。现在中国的种业我觉得问题很大，比如说企业的集中度很低，比如说种子市场混乱，比如说产学研繁育推的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种子企业的创新能力还比较弱。比如说我们基因编辑的种子还依然按转基因来管理，转基因的研究还没有得到社会很普遍的理解和认同，等等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在下一步要很好地考虑来解决的。

为什么？我给同志们报告，中国目前的小麦和大豆子产量不仅绝对值是相当于美国单产的 2/3 左右，而且近 20 年来的单产提高速度也比人家要慢。同样的，中国的油菜籽单产是加拿大的 75%，近 20 年的单产提高速度也比人家要慢。为什么？就是国外的生物技术、基因编辑技术、转基因技术在快速发展，美国的小麦、大豆 90%的面积都是转基因的，但是我们现在国内实行这样一个技术路线还困难重重，要创造条件，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一定要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否则的话这个食物自给率我看是保不住。我说的慎重主要是做好社会的科普工作，只要真正的搞农业的人都认为这是必要的。我前天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的崔博士做的视频演讲，他那个科普讲得非常好，小云，你要向他学习，你要把这个科普工作做好。现在你要问大众，真正赞同转基因食品的少而又少，所以我们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到位。这是国内怎么保食物自给率。

另一个方面，海外怎么打造安全可靠的食物供应链。因为毕竟将来我们有 30%的热量需要从国际上来供，国际上你当然通过贸易也可以拿到，但是贸易在千年大变局的情况下，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情况下，疫情我估计将来可能会是一个常态或泛常态的东西，还有地缘政治等等，所以打造安全可靠的海外供应链在这方面，中粮、中化，还有像很多集团都走出去，取得很好的成效。关键是什么呢？不要去买地租地种粮，因为我们现在要拿的是权益产品，是产品的权益，而不是要拿它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拿那个东西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风险太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从贸易端切入，然后控制我们的权益产品。这样一个思路，我就不展开了，还有其他比如政策支持不够、走出去的平台搭建不够，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都要综合起来考虑解决。

总之，我今天给大家报告，就是中国的食物自给率会怎么样，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战略主动，就要把食物自给率稳定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这需要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都要做好工作。我说的就这些，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3年第1期）

肥硕多产 科学育种：近代西方对中国家猪的考察和利用

黄 田

育种是近现代农业的关键领域。英国从农业革命猛烈推进的 18 世纪开始，便对畜牧品种的培育和改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代表人物是培育出“新莱斯特（New Leicester）”良种绵羊的贝克韦尔（Robert Bakewell, 1725-1795），他凭此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在此之后，他还试图对家猪进行品种改良，虽然他的努力没有成功，但他关于家猪育种的观念已经广为传播。他的竞争者们和后继者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家猪育种的事业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家猪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中国家猪在世界各著名猪种的育成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已成为学术界公论。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多为概括性论述，中国学者李宝澄、李锦钰、谢成侠、张仲葛、徐旺生、张法瑞、柴福珍等分别对中国猪种（特别是广东猪种）在世界各个著名猪种育成方面的贡献进行了论述，并已形成了一套历史叙事体系。相对于历史叙述的完整逻辑而言，史料的运用、史实的辨析和历史细节的考察都略显不足。首要问题，便是图像史料的缺失。有关中国家猪外传的史料延绵百余年，“中国猪”的概念含混不清，似乎西人所见之产于中国的各地方猪种都能如此表述。在此情况下，图像资料的运用或许能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尽可能地收集近代西方游记、农书中的中国家猪图像，并与相关文字史料进行互证，以期专业的养猪史学者提供一点线索，为这一论题的深入略尽绵薄之力。

从家猪观察中国社会

通过早期来华西人的各类记载，中国人爱吃猪肉的饮食习惯已在 18 世纪成为西方社会的集体印象，瑞典历史学家柏金斯（Bengt Bergius, 1723-1784）曾夸张地写道，“中国人的每一顿正餐当中都有猪肉。”在另一位评论者的固有观念中，炎热的天气会损伤人的胃部，而猪肉则会加剧这种伤害。但唯独在炎热的中国华南地区吃猪肉仍是健康的，对此他感到非常惊讶。

近代以来，对中国感兴趣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察，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也不例外。1811 年，法国作家布列东（Jean Baptiste Joseph Breton, 1777-1852）在为拿破仑皇帝的臣民介绍中国的巨著《中国缩影》中刊印了一幅名为“猪肉贩子”的彩色版画。该画原作的所有权属于法国政治家贝尔坦（Henri Bertin, 1720-1792），尽管他没有去过中国，但是他通过派遣耶稣会士、通信、互赠礼品等方式与乾隆皇帝取得联系，他本人潜心钻研中国文化，可算得上是中法科技交流的先驱。该画的作者未知，可能出自贝尔坦或与他相熟的耶稣会士之手。版画所展示的猪肉贩子衣着方式，以及切割、称量、售卖猪肉的场景成为法国人对中国市井生活的想象构建的来源。为该版画作注的布列东也没有去过中国，但这并不妨碍他将中国猪肉描述为“比欧洲猪肉更健康和美味”，“中国火腿备受推崇，外国人在广东大量购买。”他还介绍了中国渔民在船上养猪的习俗。该著作在欧洲引起很大的反响，两年之后，英文版便面世了。

西方有关中国家猪的图像最先由法国人创造并非偶然,由于数量众多的法国籍在华耶稣会士的活跃,18世纪的法国成为西方获取中国信息的主要基地。19世纪,英文文献在数量上成为介绍中国知识的主流。1878年,英国圣公会派驻香港的领班神父格雷(John Henry Gray, 1823-1890)在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人饲养家猪的各方面情况,包括中国家猪的品种特性、育种流程、对家猪各部位的充分利用、防治瘟疫,乃至用水蒸小猪以增强其骨骼强度、给猪剪尾巴以增强其抗寒能力等独特的养猪习俗,以及各种道士驱邪、祭拜猪神的民间宗教仪式。格雷盛赞中国人养猪的精细,“中国人通过日常的冲洗,维持猪栏和英国的厨房地面差不多干净的程度。”他还考察了广东猪市的情况,市场邻水而建,通过珠江水运将周边农家饲养的生猪运至市场。由于广州街道狭窄,挑夫人工便宜,所以在陆地上运送生猪并不用驱赶的方式,而是将它捆绑在竹筐中,由挑夫人力运输,这是一项西方人反复观察到的“奇观”。

从画风来看,这组图像的原作或许来源于某部中国典籍的插画,它们比之前由西方人创作的图像更能展现中国的市井风貌,这也印证着西方人对中国考察的深入。而照相机的发明,更为西方人直观地记录和传达中国知识提供了利器。1895年,英国记者、“戒酒会”编辑葛骆(William R. Kahler)在《中国假日行》中发布了中国人用独轮车运猪的照片。葛骆抱怨了独轮车发出的噪声,认为这是中国人“神经不敏感”的表现。在他笔下,“一头猪被绑在一侧而他的主人坐在另一侧的情形,并不罕见。”由具体的生活场景联想到民族性格,这是一种傲慢的民族志书写方式。

以上三组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西方有关中国家猪的图像,恰恰折射出近代西方人观察中国社会的不同视角。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想象、对中国生活方式和中国典籍的考察,以及民族志视角下的书写共同构成了近代西方人构建中国形象的几大要素。

刻画肥硕多产的特征

根据张法瑞、柴福珍的考证,“在18世纪中期,在英国的中南部已有大量的中国猪和中国杂种猪存在,……到18世纪后期,英国原有的纯土种猪已渐绝迹,代之而饲养的是具有中国猪血统的体躯丰满平滑、早熟易肥、肉质优美的良种了。”出版于1815年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补遗》中提到,中国猪种或其与当地品种杂交的品种“可以推荐为最适宜农民饲养的种类”。作为脂肪型的中国家猪,正好可以与英国当地腌肉型的土猪进行品种改良。这一时期正是英国育成巴克夏猪(Berkshire)的关键时期,经过中国家猪改良过后的英国猪种性状明显优于纯种土猪,于是西方畜牧界形成了对中国家猪肥胖、多产特征的崇拜。在相关图像文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806年,丹麦兽医学教授、皇家兽医学校校长费鲍科(Erich Viborg)在他的养猪学专著中出版了一幅中国家猪的画像。费鲍科极言中国家猪的肥胖,“腿短身长,肚子几乎垂到地面。”也盛赞它的多产,“在英国人们曾饲养了一头中国母猪,她在11年中产下20胎共355只小猪,其中最多的一胎产下了24只小猪。”也认为它的脂肪极为肥美。中国家猪在他的整本专著中得到了最高的评价。

这一时期猪种培育的中心是在英国。从英国育种学家帕金森(Richard Parkinson)出版于1810年的论文中可以一窥西方利用中国家猪的情况。在他眼中,中国家猪是最好的猪种,“身形就像一个装满任何精细物质的袋子。”它身上几乎都是肥肉而没有瘦肉,他本人觉得烤起来太过于油腻,但完全不是坏事。而英国土猪与中国家猪的杂交品种则既能快速增肥,又能保持肥瘦比例。当然,这一时期中国各地方品种的家猪都被冠以“中国家猪”的名义进行讨论,帕金森详述了英国人利用过的3种“中国黑猪(Black Chinese)”、2种“中国白猪(White Chinese)”、1种“中国黑白猪(Black-and-white

Chinese) ”、1 种“沙色或蓝色中国家猪 (Sandy or blue Chinese) ”等猪种的各种性状特点, 以及它们与各种中国土猪的杂交情况。虽然各品种的中国国家猪性状各异, 帕金森还是选择用一种最为夸张的方式来表现当时英国人心中的中国家猪肥硕的形象。由于“中国猪以腿短、身圆、背弯、肥硕而著称”,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在出版于 1848 年的《中国总论》中, 也使用了一幅类似的图像来刻画中国家猪。

这种对中国家猪肥硕多产特征的夸张刻画, 多出自于西方利用中国家猪的早期阶段, 既源自于英国育种学家对中国家猪的观察和研究, 也蕴含了他们对本土猪种不良特性的不满和急于改良猪种的愿望。从效用上来讲, 这种肥硕的家猪形象易于引起英国农民的兴趣, 鼓励他们尽最大的可能利用中国家猪, 这与当时的育种学家所提倡的用中国猪种来改良所有英国猪种的育种思想亦相吻合。当然, 育种学家们也将取得的成果用图像的方式直观地表达出来了。1859 年出版的一本育种学专著刊印了一幅改良版中国家猪的形象, 吸引着农民们前去进行育种实践。

科学育种的专业描绘

随着英国国家猪培育工作的推进, 在以上两个类型的中国家猪图像之外, 对中国家猪进行专业描绘的图像成为主流, 这是科学育种的需求决定的, 因为英国的育种工作者必须利用更加准确的图像来辅助他们的工作。这类图像文献首先包括英国学者们对中国家猪所作的较为客观的描绘。

1807 年, 为了给读者展示“被认为是接近于完美的”中国猪种的真实面貌, 英国博物学家、著名的木刻版画先驱比威克 (Thomas Bewick, 1753-1828) 特意去寻访合适的写生对象, 最后根据达勒姆郡 (Durham) 的贝克 (George Baker) 饲养的中国国家猪创作了一幅写实画像, 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宝贵的图像资料。1836 年, 苏格兰博物学家贾丁 (William Jardine, 1800-1874) 为博物学名著《自然主义图书馆》也创作了一幅中国家猪的写实画像, 从性状特征以及图像背景来看都与比威克的画作有很高的相似度, 这体现了中国家猪在博物学范畴里的知识传承。

而在英国国家猪育种史上最著名的一头中国家猪, 当属在英国著名兽医尤厄特 (William Youatt, 1776-1847) 的养猪学专著《猪》中出版的、由英国木版画家哈维 (William Harvey, 1796-1866) 根据实物创作的一头直接从中国进口的、由英国名流奥美 (William Ogilvy) 饲养的中国母猪 (图 12)。由于这是一头记录了清晰来源的家猪样本, 她的形象随着《猪》的流传和后世众多育种学家的反复征引成为了养猪学界最为人熟知的中国家猪代表。《猪》于 1847 年同时在英国和美国出版, 又相继于 1856 年、1884 年再版, 尤厄特还将她的图像定为《猪》的封面。据不完全统计, 该图像被后来的各国养猪学书籍反复征引了 4 次以上。尤厄特在《猪》中, 亦对中国家猪的性状和肉质情况作了客观的评价, 也考察了中国家猪的各个品种以及它们和英国土猪的杂交情况。经过严谨的分析, 他指出“最好的品种是巴克夏猪和中国家猪的杂交”, 这反映出英国改良猪种是一个长期进行的过程, 已经育成的所谓的“巴克夏猪”, 还在不断的杂交改良之中, 中国家猪的贡献也是一个伴随始终的长期过程。

对育种学者和养猪农民更有指导意义的图像文献是一类猪种对比图, 即将不同品种的家猪放置于同一场景, 使利用者可以直观地获取各品种的性状信息和进化关系。1841 年刊登在一份流传广泛的实用杂志的家猪对比图便体现了这种思路 (图 13)。该图将中国家猪置于最前端, 其他品种从后往前依次为野猪、未改良的老品种、黑毛或刚毛猪、改良种野猪、改良种母猪和小猪、萨福克猪 (Suffolk), 实际上便是一部英国养猪史, 由此也能看出中国家猪在英国国家猪育种谱系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英国利用中国家猪育成柏克夏猪的巨大成功,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倾向于将英国家猪和中国家猪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了。一篇 1850 年刊载于西班牙周报上的介绍养猪的文章以“盎格鲁——中国猪”之名来介绍英国的柏克夏猪。一本出版于 1858 年的法国农书干脆将英国家猪和中国家猪归纳为一个完整的血统谱系,着重于介绍从中国家猪至柏克夏猪的性状遗传。一本出版于 1860 年的美国流行杂志同样将古英国猪、柏克夏猪和中国家猪作为完整的血统谱系进行介绍,显示出这种看法已经通行于西方畜牧界了。

这一时期严肃的学术论文刻画的中国家猪形象则更为朴实,但其中所包含的信息量却更大。奥地利农学家兰博(Karl Lambl, 1822-1884)在出版于 1863 年的论文中考察了英国猪种的培育过程,如图所示,25 号中国猪与 26 号西欧猪对比而言,中国猪短、矮小、宽,细骨、无毛,西欧猪长、窄、高,骨骼强壮。二者杂交,则得到 27 号英国猪。但如果喂养护理不得当,它退化为 28 号所示的半野生状态。

综上所述,基于科学育种而对中国家猪进行专业描绘是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育种工作的需求所致。这些图像也为后世提供了反映英国猪种育成过程中的中国家猪的利用状况和品种信息等的较为可信的一手史料,值得当代农业史学者从专业的角度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母猪阉割技术的考察

除了对中国家猪本身的观察之外,西方人还对中国有关家猪的养猪技术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吸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母猪阉割技术。

早在十八世纪末,便有一位欧洲商人从中国带回一套用于给小母猪阉割的工具,后来一位到丹麦皇家兽医学校求学的兽医诺林(Norling)将这套工具以及记载了使用方法的笔记赠送给该校,校长费鲍科根据他和同事进行的实验,于 1807 年撰写论文向欧洲学界介绍中国的家猪阉割技术。

根据费鲍科的介绍,应将小猪如 Fig. 3 所示绑紧,用 Fig. 2 所示探针打开小猪耻骨,再用 Fig. 1 所示铲刀摘除小猪卵巢。他还总结出四个技术要点,即小猪阉割之前应断食 24 小时;捆绑方式要严格按照图示进行;应使小猪头部尽量向背部靠拢,更利于探针作业;右手持刀,按照费鲍科详述的入刀步骤进行。他表示,越早对小猪进行阉割手术就能收获更好的肉质,利用中国的方法进行阉割可以极大地减少母猪的痛苦和危险,它们在手术结束时便能恢复进食,伤口很快便会愈合,大约五六天便能痊愈。“这种手术方式可算一项真正的优秀技艺,对农民来说极为重要。”这项技术此后被西方的兽医专家在其兽医学体系中反复讨论。

为了继续深入了解中国的母猪阉割技术,来自斯图加特(Stuttgart)的德国兽医学教授霍夫曼(Hoffmann)委托他同事的儿子、当时正留居上海的小施密特(Schmidt jr.)对中国的母猪阉割手术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由于上海都市区兽医较少,不便观察,小施密特请求他的中文老师在较远的地区代为考察。最后小施密特将考察结果连同中文老师所画的示意图寄给了霍夫曼,由他进行实验后整理成为论文于 1890 年发表。

据霍夫曼介绍,上海周边地区进行母猪阉割手术的技术与费鲍科介绍的方法不同。首先将母猪侧绑于四方矮桌之上,在母猪左侧腹部适宜处寻找切口,比欧洲兽医习惯的切口更深。首先如 Fig. 1 所示右手持小刀,左手将皮肉下拉;切好之后如 Fig. 2 所示左手食指穿过腹膜找到卵巢;再如 Fig. 3 所示右手持小钩将卵巢和子宫角质的一部分勾出;最后如 Fig. 4 所示将组织用左手往外拉,以便右手持刀将其切除。霍夫曼详细地对比了中国和西方的技术差异,并认为除了母猪的捆绑方式之外,中国的技术全部都

优于此时流行于西方的阉割技术。在该成果的鼓励之下，小施密特还曾计划翻译一本中国的兽医学著作，继续研究这一领域。

从西方人考察中国的母猪阉割技术这一案例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中国家猪的关注是一个多方面的、长期的科技交流过程，并且随着中外人士更加频繁的交流而不断深入。西方的养猪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吸收中国家猪的血统之外，还吸收了中国的相关农学知识。

结语

图像文献所能表达的信息，往往能够补文字文献之不足。近代西方人考察中国家猪所流传下来的图像资料，展示了中西交流的丰富内涵和多种面相的历史细节。与中国家猪相关的社会活动的图像展示了西方人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角度，对中国家猪肥硕多产特征的刻画反衬出英国育种学家们对于提高本国猪种质量的鼓励，对科学育种的专业描绘则印证了英国家猪猪种育成史，对中国的母猪阉割技术的考察则显示了中外科技交流的丰富细节和多种面相。

摄影技术的发展，为西方人考察中国家猪提供了便利，大大提高了学者们描述各个品种家猪的准确性，由1945年出版的《中国的家畜》一书中所列的数十幅中国家猪的对比照片可知。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由人绘制的图像文献所蕴含的信息有时反而可能多于照片所能提供的信息，图像文献值得农史学者进一步关注。

（作者：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博士研究生。本文首刊于《古今农业》2024年第1期，原题为《从图像看近代西方对中国家猪及养猪技术的考察和利用》，图片略。）

乡村振兴需要解决好“五个问题”

——基于脱贫攻坚驻村帮扶的思考

陈雄飞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推进乡村振兴，要切实解决好“五个问题”。

一、解决内生动力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各地区各部门脱贫攻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全国共派出几十万驻村第一书记、上百万驻村干部开展帮扶工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乡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与此同时，脱贫攻坚也导致极少数群众滋生“等、靠、要、争”的思想，该自己做的事情不去做，自己能解决的事情不去解决，而“眼巴巴”坐“等”干部来送米送油送物资、环境卫生“靠”村组干部来打扫、遇到领导上门走访主动伸手“要”，“光明正大”比困难“争”当低保户。他们仿佛把自己的大事小事终身事，全权打包给了政府和驻村干部，自己却不同程度地换上了“软骨病”。更有甚者，部分基层干部也不同程度地“弃守阵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让出来”，在各项工作都有上级部门和领导挂帅督导、有其他地区单位对口帮扶的情况下，自己却摆出一副“退居二线”、“隔岸观火”的姿态，凡事等着别人安排，不积极履职、主动冲锋陷阵。

我们历来倡导众人的事情众人帮、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政府要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用于真正需要帮助的少数困难群众身上，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用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关键之处。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只有完全调动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激发其追求发展进步的内生动力，补足精神之钙，主动作为、同心同德，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凝聚起谋事成事的强大合力，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

二、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乡风文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是乡村振兴“精神层面”的更高追求。尊老爱老、相邻和睦、诚实守信、热心公益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是确保我们所处社会安宁有序的基本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从脱贫攻坚反映出的问题来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道德滑坡现象较为普遍。比如，入户路硬化引发相邻权纠纷，兄弟不和就把老人背走“送”给村委会，为一袋救济粮没有首先发给自己就对驻村工作队冷嘲热讽，借机村委修建产业路有求于己而要挟解决与其他村民的历史纠纷并提出不合理要求，对帮扶干部入户核实收入隐瞒真实情况“哭穷”而事后却修建两层小楼，省吃俭用却花大价钱修建“活人墓”，对乡镇政府、村居干部不信任，威胁辱骂驻村干部等。这些现象有的虽已涉及法律，但究其根源在于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被抛弃，形成“道德风险”，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不利因素，如果任由其继续蔓延下去，势必产生一系列乡村社会治理难题，对党和国家事业、人民生产

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乡村文明创建活动，提倡孝老爱亲、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男女平等。多种形式开展感恩教育、传统文化教育，从培养娃娃着手，抓早抓小、以小带大，促进培育良好家风、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建设文明乡村。深入推进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加强《民法典》普法宣传，引导群众参与和落实村规民约，树立“主人翁”意识，合力推动提升村居治理水平。

三、解决能力素质问题

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的前哨站、堡垒阵地，担负着落实上级政策、带领群众发展致富的重要角色，是群众的贴心人、当家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起点和关键。长期以来，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村级组织财政资金投入不足，村“两委”报酬偏低，扣除养老保险后，每月拿到的报酬不足两千元，与其承担的大量日常工作任务不相适应。尤其是脱贫攻坚后期，村干部与各级下派的驻村队员一样24小时不离村，所有人员吃住在村，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面对日益繁重艰巨的工作任务，有的村干部开始产生厌战情绪，甚至主动申请辞职。有的村不得不开始“寻找”后备村干部人选，苦口婆心上门“动员”村里有能力的群众出来“做事”，很明显，由于村干部的报酬太低，仅凭工资甚至不够养活一家人，没有吸引力，动员工作往往是一厢情愿，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党委和政府显然也关注到了这一“严峻”问题，开始下决心着手改变这一局面，2021年，全省完成了村“两委”换届。本次换届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遍实行支部书记“一肩挑”，同时大幅度提升工资待遇水平作为政策配套予以支撑。这是很好的努力和尝试，有助于吸引优秀人才投身村级事务管理，发挥“领头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和良好愿望能否达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一肩挑”人员的个人修养和能力素质决定的。由于“一肩挑”人员手中的“权力”更集中，用得好就会大大促进村里发展、造福一方百姓，用得不好甚至以此为资本从事攫取私利的勾当，则会对地方产生破坏性影响。如何真正把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担任“一肩挑”这个重要岗位，考验着基层党委政府选人用人的能力水平和精准度。

要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观，按照“德、能、勤、绩、廉”标准选拔合适人选，所选之人还要具有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愿意随时去感知群众冷暖的优秀品格。要杜绝“小圈子”文化和“家族势力”的影响，从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的政治高度，把能干事、想干事、群众信得过的人选出来。要完善年度考核与日常考核制度，探索采取直接由群众无记名评议方式考察村干部，建立跨层级监督机制，落实能上能下的干部使用制度，做到任人唯贤，避免任人唯亲。

四、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也可以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保障。脱贫攻坚期间，根据考核标准，每个村要有产业项目和集体经济收入。各地为此想方设法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既有种植蔬菜、红薯、辣椒及加工等“短平快”产业，也有投入资金较大、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养殖项目，“村村有特色产业、户户有增收项目”，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可以说，短时期内能够汇聚动员大量资源投入脱贫攻坚，这本身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人民群众的确也从这些产业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土地流转收入、务工收入、入股分红等，村集体经济得到不同程度壮大和发展，为乡村振兴打下了一定物质基础。然而，这样举国之力推进乡村脱贫致富的做法是特定历史时期采取的超常规手段，实现乡村振兴终究要回到市场经济框架下进行，过多依靠行政干

预、采取“运动式”盲目推进的做法也为后期埋下不少隐患，不可持续。比如，大量优质耕地被流转用于搭建大棚种植木耳、蔬菜等，有的需要对土地进行统一整理，这类项目由于产品滞销，加上引进的公司盲目扩大规模导致资金跟不上，出现巨额亏损而无法继续维持运行，最终项目停摆、土地荒芜，农民收不回土地又无法盘活利用。有的生猪、生态鸡养殖项目，引进时公司承诺最低收购价、每年出栏2批，在投入大量资金修建圈舍和设备后，由于种苗、饲料供应跟不上最终每年仅能出栏一批，甚至有的项目第一批出栏就出现明显滞销，还得依靠非市场方式予以“消化”。这些项目停摆后，大量圈舍、设备闲置，所占土地亦无法恢复原貌。少数项目即使后续继续运行，但合作社与公司之间陷入了愈发激烈的博弈局面，约定的资金兑付成为“老大难”问题，合作社及项目处于被“捆绑”在公司身上却无法摆脱的尴尬局面。

脱贫攻坚已胜利结束，乡村振兴的大幕已然开启。在新的征程上，发展乡村产业要结合当地实际，认真按照“八要素”要求，在产业项目选择、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产销对接、人才保障等方面，扎实做好风险评估和可持续性研判，选择符合当地实际、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项目予以实施，选好和培育产业带头人，培养一批永远不走的新时代职业农民。要尊重产业发展客观规律，不盲目寻求规模扩大、不急于追求短期利益，要在项目初期可维持的基础上，做好长远发展规划，确保资金投入、技术保障可持续。要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解决脱贫攻坚遗留问题，有效盘活资源、化解存量问题。不能因问题复杂、牵涉面广就怕担责任、畏难不前，对问题“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要及时主动、实事求是处理问题，为乡村振兴扫清发展障碍。

五、解决营商环境问题

脱贫攻坚极大地改善了乡村基础设施面貌，高速公路联通各县，农村公路提级改造，物流运输直达乡镇，互联网深度嵌入，路、电、水全部延伸到千家万户，曾经闭塞的交通和信息沟通得到了彻底改变。可以说，脱贫攻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有益探索，在此基础上总结成效经验，建立和完善了相关制度，奠定了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硬件条件改善了，“软件”也要与时俱进跟上。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要以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为抓手，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行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打造人民满意、市场主体满意的法治政府。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和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广大群众的法治素养和文化水平，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个体观、全局观、发展观，提升群众精神境界，推动形成法治化、现代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厚植乡村振兴的“肥沃土壤”，让企业家想来、敢来，“来了就不想走”。

（作者单位：贵州省政府法制研究中心，相继在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白石岩乡湾坪村、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夹石镇后村社区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3年第1期）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科院机关及各研究所、中国食药促进会
发：中国食药促进会秘书处及各部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毛振宾
副 主 编：谢久忠 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